中共革命的起源與動力

李里峰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①，這是對中共歷史地位的經典表述。所謂「開天闢地」，首先意味着中共是一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②。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這無疑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若將視角從意識形態轉向組織形態，這一判斷仍然可以成立：中共是中國第一個具有嚴密組織系統和強大動員能力的現代型政黨，從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外學界關於中共革命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棟，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然而，這場革命之於中國歷史進程與現代國家建構的意義，仍非既有論著所能窮盡，它不僅為中國邁向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奠定了主權前提和制度根基，亦深刻重塑二十世紀乃至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因其影響之深遠、面相之複雜，反思中共革命的起源、動力與後果是一個常談常新的學術命題。本文主要從組織形態出發略陳淺見，並嘗試在比較視野中反思中共革命的獨特路徑和內在邏輯。

一　起源

在中共自己的歷史書寫中，關於黨的創建主要強調三個因素：一是歷史背景，即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而奮起反抗和不斷探索的過程；二是思想準備，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三是階級基礎，即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工人運動的興起。在此過程中，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發揮了關鍵作用，前者「給中國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政治文明視野中的中共黨史基本概念研究（1921-1949）」（24&ZD017）的階段性成果。

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後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③。為更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之起源，有必要對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辨析和補充。

就歷史背景而言，舊制度的危機和崩潰是革命發生的前提，這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中提出的經典命題，後來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又在《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中通過比較歷史分析，進一步闡發了舊制度的結構性危機如何為革命創造條件④。中共革命的發生，同樣適用於這一基本論斷。在革命與舊制度的關係上，中共革命與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有所不同：君主專制這一沿襲兩千餘年的舊制度，在中共誕生前十年的辛亥革命中已被正式推翻。但舊制度的崩潰、共和國的建立，並不意味着舊危機的解除，繼之而起的北洋政府始終未能真正整合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更遑論應對列強侵略、軍閥割據、財政破產、社會失序、民生凋敝等重重困境。正是在這種舊已去、新未立的權力真空中，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底層反抗此起彼伏。沒有舊制度的危機和崩潰，就沒有革命的發生和成功。辛亥革命如此，國民革命如此，中共革命亦是如此。中共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最終取得革命勝利，正是因為其所面對的舊政權——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未能妥善回應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和挑戰。李鴻章在1874年〈籌議海防摺〉中所言「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⑤，無意間預告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命運的走向，它所指涉的並非王朝更替，而是中華文明在外力衝擊下的總體性危機，這是理解中共革命不可迴避的歷史前提。

就思想準備而言，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是中共建黨的必要條件，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共創建者所接受的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過列寧創造性發展、具有鮮明俄國特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即後來所稱的列寧主義（Leninism）。這一區別對於理解中共的政黨性質和革命道路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宏大的理論視野和歷史依據，卻並未就落後國家的革命策略和無產階級政黨作出詳盡規劃。正是在這一點上，列寧主義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它明確提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革命策略和實現路徑。所以，儘管十月革命後不久李大釗等人就開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但中共建黨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卻要等到1920年春夏之交：在



中共創建者所接受的是經過列寧創造性發展的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資料圖片）

實踐層面，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開始籌備和成立；在觀念層面，則以9月《新青年》改版重刊和11月《共產黨》月刊出版為主要標誌⑥。此外，蔡和森於8月13日、9月16日從法國寫給毛澤東的兩封長信，詳細介紹了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的基本情況，明確提出以俄為師、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主張，在內容和結構上皆與後來中共一大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二大章程(《中國共產黨章程》)高度相似，堪稱中共建黨的核心文本之一⑦。

就階級基礎而言，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共的成立當然要以工人階級的存在為前提，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和狀況，恐不宜過高估計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對建黨發揮的實際作用。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總數不過二百萬人左右，僅佔全國四億人口的千分之五；主要分布於沿海通商口岸的幾個大城市及鐵路、礦山的外資或官辦企業中，地域分布極不均衡，彼此之間缺乏橫向聯繫。中共建黨前後，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形成明確的階級意識，政治行動也極為有限。五四運動期間，上海、唐山等地工人的政治性罷工主要是為了響應學生的愛國行動，而非基於對階級使命的自覺認知。顯而易見，當時工人階級還沒有完成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變，其政治潛能遠不足以轉化為現實的組織力量。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建黨前後撰寫的文章，也並未將工人階級問題置於核心位置加以認真討論，對工人階級的組織狀況、生存處境和政治訴求都着墨甚少。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敏銳地指出，是列寧主義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向中國工人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將他們引向列寧主義⑧。

可以說，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制度想像和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思想潮流，是推動這批知識份子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直接動因，在這裏，觀念的力量要遠遠大於和早於階級的力量。辛亥革命之際，中國人借鑒模仿的主要藍本是法國大革命，而在十月革命發生後，很快出現將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進行比較，並認為後者才能代表時代潮流的看法。孫中山認為，法國革命僅僅是政治革命，俄國革命則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⑨。李大釗說，法國革命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俄國革命則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法國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俄國革命才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⑩。十月革命發生在國情與中國相似(專制歷史悠久、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蘇俄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也使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人民產生強烈共鳴，這些都是促使知識份子選擇走俄國道路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引入也使建黨先驅完成從代議制政黨到無產階級政黨(或如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說從「作為部分的政黨」到「作為整體的政黨」)的觀念轉型，為中共創建提供了最直接的藍本⑪。不用說，十月革命的爆發及其後社會主義思潮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傳播，又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和反戰浪潮密不可分的。

必須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譯介、傳播和接受是一回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則是另一回事。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如果

沒有蘇俄和共產國際這一外部因素的強力推動，中共的成立無疑會晚很多，中共革命的面貌也可能完全不同。共產國際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後，把在世界範圍內幫助和推動各國成立共產黨確立為核心目標之一。蘇俄從1920年春正式開始對華工作，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外交人民委員會幾個系統既各自行動又相互配合，從不同方面為中共建黨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派遣全權代表魏金斯基(Grigori N. Voitinsky)來華，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直接推動建黨籌備；派遣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和尼科爾斯基(Vladimir A. Neumann，化名Nikolsky)來華，與上海早期組織成員多次交談，推動中共一大召開並列席會議；尤為重要的是，為中共一大和黨的早期活動提供了絕大部分經費支持⑫。若無共產國際在組織、幹部、經費和策略上的系統性介入，中共的誕生將經歷一個更漫長的過程。

與此同時，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國也對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和中共創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石川禎浩通過綿密的文獻考證指出，日本是五四知識份子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最重要的知識中轉站。例如，李大釗、陳獨秀、陳望道、施存統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幾乎都曾留學日本；李大釗的名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依據河上肇和福田德三的文章寫成的，他本人也曾積極參加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譯自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的日文版本，而非德文原著；大量馬克思主義術語如「剩餘價值」、「無產階級」、「辯證法」等，也都來自於日製漢語。1920年夏天以後，當中共創建者的關注點從馬克思主義轉向布爾什維克主義、建黨工作開始實質性推進時，英國和美國取代日本成為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新青年》改版後新設「俄羅斯研究」專欄，刊登大量譯自歐美雜誌的有關俄國革命的文章，最大來源是位於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蘇維埃．俄羅斯》(*Soviet Russia*)。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在封面設計上完全模仿在倫敦刊行的英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The Communist*)，登載的文章同樣譯自《蘇維埃．俄羅斯》等歐美社會主義刊物，這些文獻推動「國際化了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向中國輸入⑬。

還有一個很少被關注但值得一提的外部因素，就是基督教的影響。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的早年經歷就是一個典型例證。他在武昌中華大學求學和工作期間，同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有很多聯繫，深受青年會獻身精神的感召和組織活動方式的影響。1917年8月，惲代英應武昌青年會邀請參加廬山夏令會，親見其「辦事的活潑，立言的誠摯，律己的純潔，助人的恆一」，深受觸動和啟發，回校不久即仿照青年會的做法，發起成立全國最早的進步青年社團之一互助社。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為宗旨，在活動形式上也模仿青年會，如開會時先靜坐五分鐘、每人報告自助助人經過、散會時誦互勵文，這些做法都和基督教的禱告、反省極為相似⑭。這種以團契為紐帶、注重人格互信和自我修養的組織形式，為其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向布爾什維克式組織轉變提供了實踐基礎。

最後，儘管五四知識份子和中共皆以破舊立新的反傳統形象而著稱，中共革命其實與中國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一方面，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共創建者對傳統思想文化並不陌生，在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時往往也有意識地對傳統思想資源加以利用。以李大釗為例，其早期思想中的「青春」意象、循環論色彩，以及「氣運」、「人心」等傳統概念，在他轉向馬克思主義後並未被簡單放棄，而是融入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的範疇重新詮釋，由此構建具有辯證法色彩的「循環進步觀」和「能動的唯物史觀」，堪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⑮。另一方面，傳統社會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人際網絡，為中共早期組織的建立和擴展提供了重要的社會資本。在中共建黨過程中，利用宗族關係和同鄉關係發展黨員、開展活動是很普遍的現象，早期的各種社團和共產主義小組皆有同鄉聚集的特徵。在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共從城市知識份子運動轉向農村革命的過程中，鄉村教師扮演了至關重要的「播火者」角色，正是因為他們扎根鄉土，與當地宗族和鄉里社會具有天然的血緣、地緣聯繫⑯。

二　動力

在西方學界關於中共革命的研究中，革命何以發生、何以成功是一個難以迴避的終極性問題，學者對此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看法⑰。1949年後的十餘年間，受冷戰影響，「陰謀論」在西方學界大行其道，認為中共革命是蘇聯策劃的世界革命陰謀的一部分，中共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指引下奪取權力並進行集權統治，中國國民黨則因為美國援助不力和對蘇聯的外交讓步而遭到失敗⑱。

二十世紀60年代以降，西方學界圍繞中共革命何以成功，形成幾種代表性的解釋模式。詹隼（Chalmers A. Johnson）首倡「農民民族主義」模式，認為日本人的侵略和奴役激發了中國農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共產黨利用這種情感贏得廣泛的民眾支持⑲。以塞爾登（Mark Selden）為代表的「群眾路線」模式，強調中共通過靈活有效的社會經濟政策和民主參與實踐，喚醒了廣大農民的政治意識，釋放出鄉村社會中的巨大革命潛力⑳。片岡鐵哉認為農民與中共之間不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革命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中共強大而有效的組織化控制能力，克服了農民狹隘地方主義的局限性㉑。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認為社會問題是革命的前提，民族問題是革命的催化劑，由知識份子主導的革命政黨則是促成革命的主觀力量（工具和行動者）㉒。在此問題上，陳永發和斯考切波的看法形成有趣的對照。陳永發在探討華東和華中的共產主義運動時強調中共動員策略的重要性，其書名《製造革命》（*Making Revolution*）既可以理解為中共通過動員農民而「製造革命」，也可以理解為農民經由中共動員而去「幹革命」㉓。斯考切波對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的比較

研究，則主張革命是發生（happen）而不是製造（make）的，由各種內外因素相結合而形成的結構性危機，才是引發革命的根本原因㉔。

筆者的看法是，從革命何以發生（起源）的角度觀之，以蘇俄和共產國際為核心的國際因素、外部因素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也不能低估建黨先驅的主觀能動性）；從革命何以成功（動力）的角度觀之，則中共自身的意識形態、組織結構、民眾動員和革命策略才是根本性的決定因素。從黨自身來解釋中共革命的動力機制和成功之道，答案或許在於，中共第一次將廣泛的社會基礎、有力的組織結構與有效的民眾動員真正結合起來。一個革命政黨要想生存和發展，必須通過動員民眾、激發更廣泛的政治參與來擴張力量和保持活力；與此同時，又須將其控制在特定的範圍和軌道之中，不能讓黨自身被民眾參與的洶湧浪潮所淹沒。

先看社會基礎。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中共理當把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作為發展黨員的基本對象，但受制於近代中國的現實社會結構，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眾所周知，中共的創建者基本上都是五四時期的青年知識份子，在正式建黨時全國的五十多名黨員中，僅有四名工人，其他皆為知識份子和自由職業者。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的123名黨員中，工人佔19%，知識份子及其他成份佔81%。1923年6月全國共有423名黨員，工人所佔比例仍然只有25%，知識份子及其他成份佔75%。直到國共合作、尤其是1925年五卅運動之後，中共深入到工人和農民中開展宣傳動員並從中大量發展黨員，工人成份才迅速上升。大革命期間發展的黨員中，工人所佔比例最大，其次為學生和農民。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時，全國近58,000名黨員中，工人佔50.8%，農民佔18.7%，知識份子佔19.1%，工人成份已經佔據壓倒性優勢㉕。

但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非常短暫。國共合作破裂之後，中共由合法轉入地下，主要活動空間由城市轉向農村，發展黨員的主要對象也由工人轉為農民，從1927到1949年，農民始終在黨員隊伍中佔據最大比重。這一轉變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以工人階級為革命主體的意識形態形成張力，卻恰好與鄉土中國的現實階級結構相契合。正是依託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開展和農民階級的政治覺醒，中共得以從鄉村社會汲取源源不斷的支持，最終取得革命成功。

再看組織結構。中共在漫長的革命實踐中，逐步構建起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社會的嚴密組織體系。其特徵尤其體現在基層組織的廣泛性與滲透性，黨組織不僅扎根軍隊，「支部建在連上」，更以驚人的廣度和密度延伸至基層鄉村社會。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例，1938年後形成「分局→區委→地委→縣（工）委→分區委→支部→小組」這樣複雜的組織鏈條；到抗戰後期，黨員人數已佔根據地總人口約千分之四至五，黨支部在村莊的覆蓋率已達到約20%㉖。不僅如此，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嚴格的紀律約束，最大程度地保證了這個組織體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的統一。每一個基層支

部既是政治動員的前哨，也是社會控制的節點，使中共獲得遠超一切舊式政治組織的穿透力和動員力。

與此同時，中共在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的政權建設中，在各個層級確立了以黨統政、以黨統軍、以黨統群的同心圓式權力結構。陳永發對此作過清晰的描述：中共在縣以下的社會基層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政治結構，這個政治結構由四個不同指揮系統的延伸所組成，即政權、軍事、群眾團體和黨部。縣以下的政權系統要設置鄉長、村長和各級人民代表，軍事系統要設置地方武裝和民兵，群眾團體要設置農民抗敵會、青年抗敵會、婦女抗敵會等，這些不同系統的組織背後則是黨的農村支部和區分部，各級黨部的負責人根據一元化領導原則，指揮同級的政權機構、軍事武裝和群眾組織[27]。黨組織負責制定路線方針和重大決策，政權機關負責行政事務和政策執行，軍隊負責武裝鬥爭和保衛根據地，群眾團體負責社會聯絡和民眾動員，形成一個以黨為核心的有機整體。與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其他政治力量相比，中共的組織網絡覆蓋更廣、扎根更深、效率更高，這種高度組織化的體制使黨能夠集中資源應對複雜局面，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能保持強大的韌性。

最後看民眾動員。前述西方學者的解釋模式其實都承認一個共同的前提，即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得到農民支持，農民支持又是與中共動員密不可分的，只不過，他們對中共如何動員農民、農民何以接受動員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不妨把中共革命何以成功的宏大歷史追問，置換為中共如何動員農民這一具體研究議題。國民革命時期，中共在廣東、湖南等地發動農民，卻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源與之交換，是一種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農民運動[28]。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在蘇區「打土豪分田地」，利用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動員鄉村民眾，取得顯著成效，也出現了過度動員的負面情形。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據地是事實上的執政黨，此時的民眾動員主要訴諸民族主義而非階級話語，呈現出顯著的整合性、妥協性色彩。國共全面內戰時期，中共重拾武裝奪取政權的根本訴求，動員重心從民族回到階級，一度中斷的土地改革被重新啟動，一度掩蓋在統戰旗幟下的怨恨式動員也再度發揮關鍵作用。

中共在漫長的革命進程中，無論以階級還是民族作為號召，始終把動員民眾、獲取支持作為第一要務。大致說來，中共力圖獲取的民眾支持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參與性支持，包括參與群眾運動、參加群眾組織，進而參加黨組織；認同性支持，即對中共及其政權的服從（行為上）、認同（心理上）和感激（情感上）；物質性支持，包括物力支持（主要體現為田賦和公糧）和人力支持（主要體現為參軍和支援前線）。

在革命進程中，中共發展出三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手段。一是利益導向的動員，遵循互惠交換的邏輯，中共以資源再分配的方式給農民以物質利益，農民則以提供種種支持作為回報。二是身份導向的動員，通過階級劃分將複雜多元的鄉村社會關係改造為地主與農民二元對立的剛性結構，進而塑

造一種新型的政治身份與統治秩序。三是情感導向的動員，不管各個時期的鬥爭目標是誰，調動民眾情緒（無論是民族情緒還是階級情緒）以激發其對敵人的仇恨和對中共的感激，都是和利益分配同樣重要（有時甚至更加重要）的動員工具㉙。各種動員技術的嫻熟運用和因時因地制宜，幫助中共不斷贏得民眾的參與性、認同性、物質性支持，不斷鞏固和擴大其軍事優勢、政治優勢，如此聚沙成塔，革命之成功遂一步步變為現實㉚。

三　方位

比較視野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共革命的歷史方位，借助三種不同維度的比較，可以對中共革命作進一步思考：歷時性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中共革命之比較，共時性的國共兩黨之比較，以及跨時空的法國、俄國、中國革命之比較。

首先是歷時性比較。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發生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和延續兩千餘年的君主制，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國民革命推翻了北洋軍閥統治，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並實現形式上的統一；中共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場革命既有不同的性質和目標，又有前後繼替以及不斷遞進的關係㉛。辛亥革命以「驅除韃虜」、恢復漢人國家為號召，首先呈現為種族革命的面貌；其結果則是終結帝制、建立民國，具有政治革命的意義。國民革命對外要「打倒列強」，屬於民族革命的範疇；對內要「除軍閥」，屬於政治革命的範疇；革命進程中對底層民眾進行動員，發動工農運動，具有初步的社會革命性質。中共革命延續和發展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訴求；在蘇區、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實行社會經濟變革，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社會革命；同時又引入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在民族、政治、社會革命的基礎上疊加階級革命，使革命的內涵更為豐富、目標更為徹底。

早在民國初年，很多人已經意識到革命很難「畢其功於一役」，徹底地解決各種問題，而需要不斷發動新的革命。孫中山在民國肇造後曾以為革命告一段落，打算致力於修鐵路、興實業以富國強國；但是以宋教仁遇刺為轉折點，他很快意識到革命尚未成功，先後發起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二次護法運動，最終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準備開展國民革命。梁啟超更明確指出：「歷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逃避。……革命復產革命，殆成為歷史上普徧之原則，凡以革命立國者，未或能避也。」㉜這一段話，堪稱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精準預言。

其次是共時性比較。1921年成立的中共和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從形式上看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與傳統政治組織判然有別的現代政黨，都是有

一個主義作為理論指導的意識形態政黨，都是在列寧主義建黨原則下建立起來的革命政黨，以至有學者稱它們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㉝。

但在相似的組織外表之下，兩黨有着大不相同的組織內蘊。從社會基礎來看，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所謂民族、民權、民生，其指向皆為一國之中的全體民眾。然而，這樣的全民政黨在理論上既不可能，在實踐中更難落地。國民黨在改組之前固然沒有甚麼社會基礎，改組後仍然是有全民之名而無全民之實，其社會基礎始終局限於城市地區和社會上層，在鄉村地區基本沒有影響力。共產黨將自己定位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又借助統一戰線和工農聯盟將廣大農民納入「我」方陣營，極大地拓展了黨的社會基礎。從組織結構來看，國民黨的基層組織為區黨部和區分部，受縣黨部節制，管轄範圍通常為一個到數個鄉鎮。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為支部，除了少量機關支部外，絕大多數農村支部以村莊為單位設立，其上有分區黨委，分區之上才是縣黨委，在組織層級上顯然更為深入、貼近底層民眾。從組織運作來看，改組後的國民黨並未如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政黨，「以黨治國」在縣以下所託無人，是一個組織基礎非常脆弱的執政黨，和前文所描述的中共組織形態形成鮮明反差㉞。

與國民黨相比，中共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廣泛社會基礎，得以在鄉土中國如魚得水、自由發展；建立數量眾多、組織嚴密、運作有效的基層組織，得以在實際工作中真正貫徹黨的命令和決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制定嚴格的組織紀律並能在實踐中認真執行，得以通過懲戒和威懾對黨員進行有效控制。正是這些優勢，導致國共兩黨強弱有別的組織力和各自不同的歷史命運。中共在現代政治史上的意義在於，它真正實現了一場眼光向下的革命，將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內聚力與代議制政黨的廣泛群眾基礎合而為一，並順應中國現實，主要從農村而不是城市、農民而不是工人那裏汲取能量，從而成就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革命。

最後是跨時空比較。斯考切波對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作了明確區分，在她看來，只有社會結構變遷與階級突變同時進行、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同時展開的革命，才能稱作社會革命；相比之下，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政權結構而非社會結構，而且並不必然經由階級衝突來實現。在此意義上，只有法國、俄國和中國的三場革命符合社會革命的標準。斯考切波認為，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在起源、過程和結果方面都顯示出重要的相似性：都發生在由官僚系統所支撐的君主專制國家，舊制度都面臨着權威衰落、農民反叛、外部軍事失敗的結構性危機；革命過程中都呈現出暴力衝突和階級鬥爭的特徵；革命之後都建立了更加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民族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大國地位和潛在能力也都得到提升㉟。

筆者認為，除了三場革命的共同特徵之外，還可以進一步分析兩兩之間的相似性，以及每一場革命的獨特性。先看兩兩相似的共同性。首先，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都發生在具有長期超驗宗教傳統的國家，宗教因素在革命的

發生和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兩場革命都是以首都和大城市為中心的，在革命成功、新政權建立之後，才將革命者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架構擴展到全國範圍。其次，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開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同於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中俄兩國在革命勝利之後都建立了執政黨全面嵌入國家權力結構的黨政體制，建立了國家力量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後，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相似性更多地體現在政治文化上，例如對平等價值的強烈偏好、對人民主權的堅定信念、對暴力革命的正當性辯護、革命與反革命的二元對立、只爭朝夕的急切心態，等等。

再看每一場革命的獨特性。法國革命發生在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和大本營，革命觀念與實踐皆深受以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影響；革命前夕的舊制度仍是君主專制體制，卻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公民社會；法國革命又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將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相結合的原發型革命，可以說是「大革命」的源頭；革命成功以後雖然經歷諸多曲折甚至復辟，但最終確立了代議制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俄國舊制度的一大特徵是農奴制傳統，與中國和法國自由農民佔據人口多數很不相同；俄國革命是首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視為法國革命之後的另一種原發型革命；具有最顯著的速成特徵，從二月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代議制政府到十月革命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僅僅經歷了半年多時間，即便算上作為預演的1905年革命、革命之後的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也不過十七年。相比之下，中國革命的獨特性體現在：革命之前君主專制已經存在兩千多年，遠遠超過法國和俄國；革命的理念和方式皆深受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具有次生型革命的特質；革命的重心在農村而不是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而不是工人或士兵，本質上是一場由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革命；具有最顯著的繼續革命或不斷革命的特徵，除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三場革命，1949年建政之後仍然長期延續革命風格，直至改革開放以後才告一段落。

四　小結

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創建已有105年，執政已有77年，改革開放已有48年。1949年前後、1978年前後的歷史特徵各不相同，但不同階段之間仍有清晰可辨的接續關係。首先，革命年代為當代中國留下的最大遺產，就是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36]，使中國在經歷百年屈辱之後重新獲得獨立和統一，為現代國家建構奠定了根本前提。其次，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中共在革命和建政過程中將自身嵌入政權結構之中，形成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高度整合的黨政體制，建構了一個以黨為核心和中軸的國家權力結構[37]。再次，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革命黨和以治國理政為中心的執政黨，性

質不同、任務有別，但在組織結構和政治風格上一脈相承，中共始終是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而常態化、制度化的治理方式與非常態、運動式的動員方式相結合，也一直是實現黨和國家意志的有效途徑㊳。進入後革命時代，革命遺產依然深刻影響着當代中國的政治運行與社會生活，理當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反思中共革命的起源、動力與後果，以便更好地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坐標和發展走向。

註釋

①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514。

②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12。

③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11月11日通過），《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④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著，何俊志、王學東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⑤ 李鴻章：〈籌議海防摺〉（1874年12月10日），載《李鴻章全集》，第二冊（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頁825。

⑥⑪ 李里峰：〈從「主義」到「黨」：政黨觀念轉型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江海學刊》，2021年第2期，頁17-32；18-20。

⑦ 〈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載《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49-54、63-72。

⑧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19-20。

⑨ 孫中山：〈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説〉（1921年12月10日），載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5-28。

⑩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庶民的勝利〉（1918年10月15日），載人民出版社編：《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102、111。

⑫⑬ 參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75-292；15-74。

⑭ 覃小放、余子俠：〈惲代英與基督教青年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126-27。

⑮ 李里峰：〈能動的唯物史觀：李大釗「青春」意象與歷史觀念之再探〉，《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1期，頁33-50。

⑯ 劉昶：〈革命的普羅米修斯：民國時期的鄉村教師〉，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六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頁42-71。

⑰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89), 3-33;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London: Routledge, 1995), 222-58.

⑱ 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60).
⑲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⑳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㉑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㉒ 畢仰高（Lucien Bianco）著，何啟仁譯：《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202-209。
㉓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㉔ 何俊志：〈譯者序〉，載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頁viii。
㉕ 以上數字參見趙樸：〈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一至六），《黨史研究》，1981年第2期至1983年第2期。
㉖ 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137、50-51。
㉗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354。
㉘ 王奇生：〈革命的底層動員：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載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93-94。
㉙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李冠南、何翔譯：〈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載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97-121。
㉚ 李里峰：〈中國革命中的鄉村動員：一項政治史的考察〉，《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頁193-204。
㉛ 王奇生：〈導言：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載《新史學》，第七卷，頁1-24。
㉜ 梁啟超：〈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庸言》，第1卷第14號（1913年6月16日），頁1-2。
㉝ 章開沅：〈序〉，載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3。
㉞ 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㉟ 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頁4-5、42-43。
㊱ 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頁146。
㊲ 景躍進、陳明明、肖濱主編：《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頁4-8。
㊳ 李里峰：〈中國政治的變與常：長時段的歷史透視〉，《江蘇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頁31-42。

李里峰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